

“政治共处”协议与秘鲁的社会转型

谢文侃

内容提要：1956年大选前，代表寡头集团的总统候选人普拉多在谈判中承诺当选后恢复阿普拉党合法地位，阿普拉党则承诺在大选中支持普拉多，双方从对抗走向结盟的历史事件被称为“政治共处”协议。该协议达成的背景是伴随秘鲁社会转型向纵深发展而出现的民众主义运动高潮，阿亚的投机和阿普拉党背离民众主义初衷是阿普拉党接受与寡头集团结盟的重要原因，而零和博弈的政治文化则导致了阿普拉党未能与贝朗德阵营合作。协议的达成使秘鲁的政治格局重新“洗牌”，军方立场的转变成为1962年的政变埋下了伏笔。更为重要的是，协议的达成加剧了秘鲁社会的分裂，两大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零和博弈不断升级，导致军方在1968年再次发动政变并全面接管政府。协议达成的原因和影响凸显了秘鲁社会转型陷入只有排他性增长而没有包容性发展的困境。秘鲁民众主义的本质是寻求包容性发展，当文官政府破解困境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军方便承担起这项历史任务。秘鲁寻求包容性发展的曲折经历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反思与借鉴。

关键词：社会转型 政治共处 阿普拉党 零和博弈 排他性增长 包容性发展

作者简介：谢文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2) 01-0046-16

1956年大选前夕，代表寡头集团的总统候选人普拉多在谈判中向即将卸任的奥德里亚总统承诺当选后将不会对其任期内的的问题追责，同时承诺恢复阿普拉党的合法地位，作为回报，阿普拉党将号召民众在大选中支持普拉多，三方达成的协议被称为“政治共处”协议。协议的达成宣告曾经的民众主义运动领导力量阿普拉党和昔日政敌寡头集团从对抗走向结盟，是秘鲁社会转型过程中引人关注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国内学界对协议达成的原因和影响的研究付之阙如，尚未能够更深入地理解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秘鲁社会转型的主要特点。本文通过分析协议达成的原因及影响，尝试更全面地解读阿普拉党领袖阿亚的思想，更准确把握秘鲁民众主义的内涵和秘鲁民众主义运动的走向，更准确地理解20世纪60年代两次军人政变的原因和性质，以便理清秘鲁社会转型面临的困境。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①，本文从秘鲁第二次民众主义运动高潮、阿亚思想中利己和妥协的成分、阿普拉党背离民众主义初衷和秘鲁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四个方面剖析“政治共处”协议达成的原因，进而分析协议对秘鲁政治格局和社会转型的影响。

一 “政治共处”协议的缘起

19世纪末，秘鲁作为初级产品出口国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开启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由阿亚·德拉托雷（V́ctor Raúl Haya de la

^① 国内外学者对于“政治共处”协议的原因和影响的研究分散于不同的专著和论文中。有学者认为，虽然阿普拉党是最早提出“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统一战线”的政党，但这一主张从未变成现实，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阿普拉党的机会主义使其与寡头集团和帝国主义结盟，参见 Víctor Villanueva, “The Petty – Bourgeois Ideology of the Peruvian Aprista Party”, i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4, No. 3, 1977. 曼雷克通过对阿亚书信的分析展现了他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50年代中期在思想上的变化。参见 Nelson Manrique, *¡Usted Fue Aprista! Bases para una Historia Crítica del APRA*, Lima: Fondo Editorial de l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2009, p. 175. 有学者指出，阿普拉党是在与德拉瓦勒、普拉多和贝朗德三方谈判之后才做出支持普拉多的决定，参见 Bethell Leslie (ed.), *Historia de América Latina*, 16. *Los Países Andinos desde 19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Julio Cotler, *Clases, Estado y Nación en el Perú*,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1986. 有学者对1963年到1968年贝朗德政府期间的经济社会政策进行了研究。参见 James Petras y Nelson Rimensnyder, “Los Militares y la Modernización del Perú”, en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Vol. 13, No. 4, 1970, pp. 90 – 123; E. V. K. Fitzgerald, *La Economía Política del Perú, 1956–1978: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Reestructuración del Capital*,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1981. 在国内学界，韩琦指出阿亚接受普拉多提出的结盟提议是因为普拉多承诺在胜选之后恢复阿普拉党的合法地位，参见韩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拉美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李蕊认为阿普拉党的“右转”与其寻求在体制内发展的目标有关，参见李蕊：《对秘鲁阿普拉党适应性转型的初步分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14年第5期。

Torre) 创立的秘鲁阿普拉党是秘鲁第一个现代政党,也是秘鲁社会转型启动阶段社会运动的先锋。阿亚主张社会中间阶层、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和买办寡头集团统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他的民众主义理论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秘鲁社会,依附、不平等和落后是秘鲁社会的根本痼疾,在秘鲁众多的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由帝国主义国家、买办寡头集团、山区大地主组成的少数“压迫阶级”和工人阶级、印第安农民等社会中间阶层组成的多数“被压迫阶级”之间的矛盾^①。阿亚主张“被压迫阶级”联合“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组成统一战线”在夺取政权之后建立“反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来实现社会主义。

在1931年的总统选举中,年仅36岁的阿亚惜败于寡头集团推举的候选人。次年,阿普拉党中的激进分子在特鲁希略发动武装起义,试图通过武力夺取政权,结果起义在军方镇压下宣告失败。起义发生后不久,秘鲁政府即将阿普拉党列为非法政党,包括阿亚在内的领导层遭到追捕,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在秘鲁军方眼中,阿普拉党成为煽动暴力、破坏社会稳定的代名词,军方明确表示不会允许阿普拉党再度染指政坛。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阿普拉党和秘鲁民众主义运动发展的低潮期,获得阿普拉党支持而上台的布斯塔曼特进步政府也仅维持了3年,就在1948年由曼努埃尔·奥德里亚(Manuel Odría)将军发动的政变中被推翻。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文官还是军人当政,政府推行的都是所谓的“正统”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以初级产品出口为导向;国民经济围绕初级产品出口运行;当国际收支遇到周期性困难时,政府通过收缩内需和货币贬值等方式进行调控;资本流入和利润流出几乎不受限制,国家只对经济进行最少的干预。

进入20世纪50年代,由于执政期间对社会运动的暴力镇压和政府内部腐败横行,奥德里亚政府遭到了广泛批判,不得不放弃连任计划,并承诺在1956年举行大选。由于1956年的大选是时隔11年首次举行的大选,秘鲁政坛的各支力量纷纷动员起来开展竞选活动。然而,此时的阿普拉党还未恢复合法地位,包括阿亚在内的领导层也几乎全部在海外流亡。由于军方明确表示不会允许阿普拉党参选,因此阿亚决定不返回秘鲁,但他全权委托阿普拉

^① V. R. Haya de la Torre, *Ideología Aprista—El Antiimperialismo y el APRA*. Haya de la Torre Obras Escogidas. Tomo II, Lima: Edición Homenaje de la Comisión del Centenario del Nacimiento de Ví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 2008, p. 151.

党秘书长拉米罗·普利亚莱（Ramiro Priale）返回秘鲁与各方接触，寻找恢复阿普拉党合法地位的机会。

参加总统选举的共有埃尔南多·德拉瓦勒（Hernando de Lavalle）、曼努埃尔·普拉多·乌加尔特切（Manuel Prado Ugarteche）和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Fernando Belaúnde Terry）三人。被迫放弃连任计划的奥德里亚为了确保新当选的总统不对自己任内的腐败和镇压平民行为追责，推举了自己阵营中的德拉瓦勒参加选举，同时也与阿普拉党展开了谈判。然而，奥德里亚提出的以恢复阿普拉党合法地位换取后者对德拉瓦勒支持的方案遭到了军方否决。在寡头集团内部，不同候选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曾在1939—1945年期间担任总统的普拉多脱颖而出。与奥德里亚一样，普拉多意识到阿普拉党的参与对顺利实现政权更替至关重要。但与军人出身的奥德里亚相比，普拉多更有政治手腕，他一方面公开宣称他如果当选将不会恢复阿普拉党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则与普利亚莱展开了秘密谈判。第三位总统候选人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建筑师贝朗德，作为政坛新面孔，他直到最后一刻才收集到参选总统所需的两万个选民签名。贝朗德的竞选纲领与20世纪30年代初阿普拉党的民众主义思想颇为相似。他认为秘鲁需要一场社会变革，主张进行土地改革，并将外资控制的石油产业国有化。

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但贝朗德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随着投票日的临近，贝朗德大有后来居上之势。1956年6月8日，在选举前9天，超过6万名支持者涌入首都利马的圣马丁广场为贝朗德造势。面对贝朗德势如破竹的选情，奥德里亚、普拉多和阿普拉党三方代表连夜在奥德里亚位于蒙特里克（Monterrico）的住所举行谈判，最终三方达成协议：首先，普拉多承诺当选总统后恢复阿普拉党的合法地位，并允许阿亚参加1962年大选；其次，阿普拉党承诺动员本党支持者为普拉多投票；第三，普拉多向奥德里亚承诺当选之后不会对其执政期间的各种问题展开调查。这项协议在历史上被称为“蒙特里克协议”或“政治共处”协议（La Convivencia）。

为了避免各自的支持者出现反弹，三方的谈判是秘密进行的，协议达成之后也并未在第一时间对外公布。阿普拉党虽在竞选集会上号召支持者为能够恢复阿普拉党合法地位的候选人投票，但并未直接提及普拉多。流亡海外的阿普拉党成员利用选举法禁止在投票前两天开展竞选活动的规定，直到1956年6月14日晚才对外宣布阿普拉党将支持普拉多。最终，在17日举行的选举中，普拉多以不到10%的优势战胜了贝朗德当选总统。当选后的普拉

多也履行了承诺，在 7 月 28 日的国会上通过赦免法案恢复了阿普拉党的合法地位，而前总统奥德里亚也顺利卸任。

二 “政治共处” 协议达成的原因

“政治共处”协议的达成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民众主义运动迎来新高潮是协议达成的背景，阿亚的政治投机和阿普拉党背离民众主义初衷是阿普拉党接受与寡头集团结盟的原因，秘鲁政治文化的影响是阿普拉党和贝朗德阵营无法合作的原因。

（一）反寡头运动迎来新的高潮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秘鲁的民众主义运动迎来了新高潮，遭遇危机的寡头集团为了维持统治地位被迫转而寻求阿普拉党的支持。

从 1931 年阿亚在选举中失利到次年“特鲁希略起义”被镇压，两次行动无不反映出阿普拉党无法在体制内外夺取政权，秘鲁的民众主义运动刚刚兴起就陷入漫长的低潮期。虽然最重要的领导力量阿普拉党被剥夺合法地位，最主要的领导人阿亚流亡海外，但秘鲁的民众主义运动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而是在蛰伏中积蓄力量。这一阶段民众主义运动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秘鲁社会内部，一是新兴利益集团的形成，二是寡头集团统治导致的结构性矛盾。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到 50 年代，秘鲁在人口、市场和资本积累方式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一，秘鲁人口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开始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和聚集。这一时期该国总人口增加了 65%，城乡人口比例从 29.7：70.3 上升到 43.4：56.6。^①第二，统一的国内市场逐渐形成并扩大。泛美公路秘鲁段的修建，使得秘鲁沿海地区摆脱了传统水上沿岸贸易的各种限制，通向中部山区和东部亚马孙流域地区的公路也陆续开工。从 1929 年到 1948 年，秘鲁的公路总里程几乎翻倍，而国内的邮政业务量则增长了 150%。^②从 1940 年到 1970 年，秘鲁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4 倍多。第三，人口增长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使得依赖国内市场的资本积累方式成为有利可图之事。在秘鲁的经济结构中，除了在 20 世纪头 30 年中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初级产品出口

^① Bruno Seminario, *El Desarrollo de la Economía Peruana en la Era Moderna: Precios, Población, Demanda y Producción desde 1700*, Lima: Universidad del Pacífico, 2016, pp. 513 - 514.

^② Carlos Contreras (ed.), *Compendio de Historia Económica V: La Economía Peruana entre la Gran Depresión y el Reformismo Militar*,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2014, pp. 235 - 236.

经济之外，依赖国内消费的农业、工业、建筑、运输、能源、商业和服务业等产业组成的内向型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从1930年到1956年，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4.6%上升到了24%，产值增长了4.4倍，与此同时，由农业、渔业和矿业等组成的初级产品产业的产值占比从43.3%下降到30.7%。^①由于秘鲁内向型经济的增长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不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这使得在传统的农矿产品出口寡头、商业和金融寡头之外，一个以食品、服装、化工、机电等加工制造业本土资产阶级为核心，依靠国内市场的利益集团得以形成并逐渐壮大。

在内向型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寡头政权主导的“正统”增长模式导致了秘鲁经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矛盾的焦点是只有少数人从外向型增长模式中获益。第一，农矿产品出口产业不断侵占农村耕地，失去土地的农民陷入生存危机，农民运动日益高涨。第二，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加上人口激增，导致秘鲁国内出现粮食短缺问题，甚至需要动用外汇储备进口粮食。第三，尽管本土制造业发展迅速，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渐接近了初级产品出口产业，同时还吸收了大量就业人口，但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加上缺乏以工业化为支撑的城市化，使秘鲁经济过早地出现了“第三产业化”现象^②。因为土地被剥夺而离开农村的内部移民既无法在城市中的现代经济部门中就业，也无法回到农村，只能栖居在城市郊外的贫民窟内，从而在正规经济之外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非正规经济。第四，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吸引了外国资本的流入。与以往不同的是，外国资本对秘鲁经济的控制不再仅仅通过产权，而更多是通过掌握技术、专利等方式来实现。本土中小企业在外国公司和本土银行的合谋之下很快被挤出市场^③，对外国资本的负面评价和敌视情绪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流。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各个社会阶层都不约而同地将贫困、不平等、对外依附等问题的矛头指向垄断国家资源的寡头集团，秘鲁的民众主义运动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潮。受到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发展主义理论的影响，在秘鲁

^① Carlos Contreras (ed.), *Compendio de Historia Económica V: La Economía Peruana entre la Gran Depresión y el Reformismo Militar*,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2014, pp. 522 - 523.

^② Félix Jiménez, *La Economía Peruana en el Último Medio Siglo - ensayo de Interpretación*, Lim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2010, p. 288.

^③ E. V. K. Fitzgeral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n Intermediate Regime",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8, No. 1, 1976, p. 64.

社会中，尤其是在依赖内向型经济的社会阶层中产生了用内向型增长取代外向型增长以解决秘鲁社会问题的思潮。1955年，新兴社会中间阶层成立了全国民主青年阵线并推举贝朗德为1956年大选候选人。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贝朗德，不仅发动了希望改变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社会中间阶层，还将陷入贫困的工人阶级和受压迫的农民动员起来。面对异军突起的贝朗德阵营，寡头集团虽然是控制国家资源的特权阶层，但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为了能在选举中获得足以胜选的选票，寡头集团不得不改变策略向阿普拉党寻求支持。

（二）阿亚的思想具有利己和妥协的成分

面对权力的诱惑，阿亚思想中的利己心理和妥协态度使其走上了政治投机之路。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拉美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和政治主张之一，阿亚的早期思想体现了在社会转型中受负面冲击的中间阶层的主张，它既具有进步性又有保守的方面。阿亚早期思想的进步性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遭遇危机、社会主义制度刚刚从理论变成现实不久的20世纪20年代末，它看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先进性和苏联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同时它认为在拉美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不能照搬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僵化地模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应将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探索符合拉美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在具有进步性的同时，阿亚的思想也有着保守的一面，这主要体现在对待社会变革的利己心理和对待帝国主义的软弱性。这种利己心理和妥协态度是他接受寡头集团结盟提议的重要原因。

第一，在政治实践中，阿亚总是以社会中间阶层的利益为重。阿亚认为“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统一战线”必须由社会中间阶层而不是无产阶级领导。在他的代表作中阿亚这样写道：“我们国家的中产阶级……是被统治的阶级，他们希望成为统治阶级的愿望止步于帝国主义设置的障碍前，因为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不能容忍对手存在的统治阶级”。他还说：“在我们的国家中，中产阶级是最具有斗争能力的。他们处于最英勇的时期。”^①1956年，面对昔日政敌抛来的“橄榄枝”，阿亚首先想到的是个人得失。“特鲁希略起义”失败后遭到寡头政权迫害的阿亚不得不长期流亡海外，从1949年到1954年他还在哥伦比亚驻秘鲁大使馆内政治避难长达5年之久。不断流逝的时间成为阿亚最大的“敌人”。1931年阿亚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时只有36岁，25年之后

^① V. R. Haya de la Torre, *Ideología Aprista - El Antiimperialismo y el APRA*. Haya de la Torre Obras Escogidas. Tomo II, Lima: Edición Homenaje de la Comisión del Centenario del Nacimiento de Ví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 2008, p. 179.

的1956年，这位曾经踌躇满志的青年已年过花甲，却从未有机会将自己的理论和主张转化为实践。对于阿亚而言，与寡头集团结盟是他重返政坛的最后机会，在权力诱惑面前他无法拒绝普拉多的提议。

第二，尽管在著述中对美帝国主义进行了激烈批判，但在实践中阿亚采取了妥协的态度。1931年大选前夕，阿亚与美国驻秘鲁大使弗雷德·莫里斯·迪林（Fred Morris Dearing）举行了会面，在发回给美国国务院的信件中，迪林这样描述与阿亚的接触：“阿亚·德拉托雷希望我国政府给予阿普拉党最大程度的谅解和尽可能多的帮助……现在我并不确定他能否在选举中获胜，但是据我目前的了解，我可以说即使他当选总统，我们也没有什么需要恐惧的。恰恰相反，阿普拉党政府将会是一个有着强烈自由主义倾向，并且对美国有利的政府……”^①。1955年，阿亚在著作中提出有政治和经济两种不同的帝国主义。他认为，美国政坛长期存在着“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两股同样强大的舆论，随着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以及睦邻政策的实行，政治上的帝国主义威胁已经消除^②；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能帮助拉丁美洲国家消灭封建残余，“如果印第安美洲国家的工业化只能在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体系中完成，那么就可以得出以下无可辩驳的结论：帝国主义是一种有双重作用的现象，它既意味着危险，又给经济落后的国家带来进步”^③。在阿亚的思想中，既然政治上的帝国主义威胁已经消除，寡头集团所依附的经济帝国主义又是进步的力量，那么和寡头集团结盟也就顺理成章了。

阿亚的思想在最初提出时是具有先进性的，而它保守的一面也因阿普拉党长期在地下活动被掩盖了。在1956年大选中，面对权力的诱惑，这种思想的弱点暴露无遗。阿亚为了一己私利，向帝国主义妥协，走上了与寡头集团结盟的投机之路。

（三）阿普拉党背离了提出民众主义的初衷

强调阶级联盟的民众主义是阿普拉党最重要的主张和获得广泛支持的基础。阿普拉党民众主义理论在提出后获得了比同时代其他变革方案更广泛的

^① Julio Cotler, *Clases, Estado y Nación en el Perú*,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1986, pp. 239 - 242.

^② V. R. Haya de la Torre, *Ideología Aprista - El Antiimperialismo y el APRA. Haya de la Torre Obras Escogidas. Tomo III*, Lima: Edición Homenaje de la Comisión del Centenario del Nacimiento de Ví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 2008, p. 224.

^③ Nelson Manrique, *¿Usted Fue Aprista! Bases para una Historia Crítica del APRA*, Lima: Fondo Editorial de l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2009, p. 175.

支持，并一度成为秘鲁社会运动的指导思想，除了阿亚本人发挥的重要作用，更因为这一方案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方向。

学生时代的阿亚曾担任秘鲁学生联合会主席，他率领学生声援工人争取 8 小时工作制的运动并取得成功，很早就与工人阶级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同时他又受到秘鲁近代最早反思民族国家建设问题的思想家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Manuel González Prada）影响，十分关注印第安人问题，多次亲自前往中部山区考察印第安人生活。加上阿亚擅长社交，口才出众，由他创建的阿普拉党成立后很快就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1931 年竞选过程中“只有阿普拉党才能救秘鲁”（¡Sólo el APRA salvará al Perú!）的口号在民众中广为流传。除了阿亚的影响力，阿普拉党领导的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是因为民众主义理论立足秘鲁实际，反映了社会多数的根本诉求。20 世纪 30 年代的秘鲁，政党政治刚刚起步，民众阶层并没有代表自己利益和诉求的政党。当时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还是无政府主义，而对生活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农民而言，组建代表自身诉求的政党更不切实际。阿普拉党提出的民众主义，在半封建、半依附资本主义的秘鲁社会，将中间阶层、工人和农民这些各自力量较为薄弱但代表着社会多数的阶层联合起来，形成了挑战统治阶级的合力。虽然阿亚未能在 1931 年的选举中获胜，但团结和动员社会大多数、主张将经济增长的红利进行更公平分配^①的民众主义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方向。

尽管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秘鲁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国家资源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依附、不平等和落后的社会现实并未改变，团结社会多数、追求公平分配经济增长红利的民众主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然而，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使阿普拉党逐渐背离了民众主义的初衷。在客观上，从 1931 年选举失利到 1956 年大选，在长达 20 多年的时间里，阿普拉党既是反寡头运动的先锋也是寡头统治最大的“受害者”，长期遭到镇压严重限制了阿普拉党的社会动员能力。比客观原因更重要的是，阿普拉党领导层从主观上未能做到与时俱进、坚定信念，而是用僵化的眼光看待不断变化的现实。具体而言，阿普拉党并未重视国内经济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即内向型经济的发展和依赖内向型经济的社会阶层的扩大，更没有积极地团结和动员这些新兴

^① Liisa North y Mario Dos Santos, “Orígenes y Crecimiento del Partido Aprista y el Cambio Socioeconómico en el Perú”, en *Desarrollo Económico*, Vol. 10, No. 38, 1970, p. 212.

社会阶层。通过对比 1931 年和 1962 年两次阿普拉党正式参选数据可以看到，该党在全国的总得票率只是从 32.98% 略微上升到 35.83%；得票率超过 40% 的大区仅局限于初级产品出口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而在内向型经济快速发展的首都利马和第二大城市阿雷基帕等地，1962 年阿普拉党的得票率相比于 1931 年不但没有上升，反而还出现了大幅下降^①。这些数据表明，虽然阿普拉党长期遭到镇压，但支持者并没有放弃，反而是阿普拉党背离了民众主义的初衷。在阿普拉党迷失方向的同时，有着相似主张的贝朗德阵营不断壮大并取代了阿普拉党民众主义政党的地位。社会基础急剧收缩的阿普拉党变成了支持者集中在外向型经济部门中的“地区党”和“劳工党”。在 1956 年的大选中，为了维护支持者的利益，阿普拉党选择与同样从外向型经济中受益的寡头集团结盟。

（四）秘鲁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如果说民众主义迎来新高潮使得寡头集团不得不向阿普拉党寻求支持，阿亚思想中利己和妥协的成分以及阿普拉党背离民众主义的初衷是阿普拉党接受寡头集团结盟提议的原因，那么围绕着“政治共处”协议的达成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为何昔日的反寡头先锋阿普拉党和新兴的反寡头先锋贝朗德阵营没有合作，而是成为竞选中的对手？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秘鲁政治文化零和博弈的特点导致了整合困难。

社会长期分裂和不平等是秘鲁政治文化形成的土壤。在殖民地时期，在按照宗主国政治意识形态构建起来的等级森严的社会中，西属殖民地的人口被分成不同的等级和职团，这种结构导致了社会利益的碎片化，阻碍了共同身份认同的形成。在一个“没有脊梁”的社会里^②，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零和博弈为底层逻辑的政治文化逐渐形成，而零和博弈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裂。这种恶性循环在秘鲁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反复上演，阻碍了秘鲁的政治整合。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秘鲁第一次民众主义运动高潮中，秘鲁政坛左翼，除阿普拉党外，由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创建的秘鲁社会党（后改名为秘鲁共产党）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与阿普拉党阶级联盟的主张不同，秘鲁社会党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将阶级斗争视作秘鲁社会的主要矛盾，主张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

^① Liisa North y Mario Dos Santos, “Orígenes y Crecimiento del Partido Aprista y el Cambio Socioeconómico en el Perú”, en *Desarrollo Económico*, Vol. 10, No. 38, 1970, p. 175.

^② Julio Cotler, *Clases, Estado y Nación en el Perú*,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1986, p. 40.

命，夺取政权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1930年之前，阿亚和马里亚特吉对社会变革的方案虽然存在分歧，但两人均将各自主张当作理论探索的一部分，并且两人还在传播社会变革思潮的实践中通力合作。由于马里亚特吉在1930年英年早逝，而他的继任者脱离秘鲁实际，盲目跟随共产国际领导，再加上阿亚又早已与共产国际决裂，阿普拉党和秘鲁共产党这两股原本可以合作的政治力量开始走向对立。在1931年大选过程中，为了争取更多选票，摆脱“革命党”形象，阿普拉党甚至对秘鲁共产党进行了污名化宣传^①。但这样做并没有帮助阿普拉党赢得选举，只是使得秘鲁共产党的力量遭到大幅削弱并就此一蹶不振。秘鲁左翼内部零和博弈导致的整合失败是秘鲁民众主义运动虽然迎来第一次高潮但却未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零和博弈不仅出现在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中，也发生在资产阶级内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秘鲁的鱼粉产业。渔业并非秘鲁的传统产业，1940年之前在秘鲁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在普拉多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秘鲁渔业增长迅速，产量翻了七番。虽然农矿产品寡头集团也进行了一定的投资，但是秘鲁渔业最初的资本主要来自本土的中小资产阶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并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朝鲜战争的爆发刺激了国际市场对秘鲁渔业产品的需求^②，渔业成为秘鲁外向型经济中增速最快的产业。朝鲜战争结束后，由于最大市场美国对本土渔业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秘鲁渔业资本家不得不探索从先前供人食用的金枪鱼转型为作为饲料和化肥的鳀鱼粉。秘鲁渔业发展导向的调整引起了代表农产品出口商的秘鲁鸟粪管理公司的警觉，因为作为化肥的鳀鱼粉可能会对鸟粪在国内化肥市场的垄断地位构成威胁，并且大量捕捞鳀鱼意味着海鸟将失去重要的食物来源，导致鸟粪产量减少。1952年，秘鲁农产品出口商向财政部提出申请要求禁止捕捞鳀鱼，由于农产品出口商属于控制政府的农矿寡头集团的一员，他们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政府支持。除此之外，为了打压来自渔业产品的竞争，农产品寡头集团还通过行政命令等手段将渔业生产从鱼粉引导至食用产品。^③

当民众主义运动再次迎来高潮，阿普拉党和贝朗德阵营这两支新旧反寡头先锋原本有机会通过合作充实反寡头阵营的力量，然而秘鲁的政治文化阻

^① Paulo Drinot, “Creole Anti-Communism: Labor, the Peruvian Communist Party and APRA, 1930-1934”, in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2, No. 4, 2012, pp. 703-736.

^{②③} Baltazar Caravedo Molinari and Stephen Gorman, “The State and the Bourgeoisie in the Peruvian Fishmeal Industry”, i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4, No. 3, 1977, p. 107, p. 110.

碍了两者的合作。由于阿普拉党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和贝朗德阵营代表的内向型经济之间缺乏整合，并且寡头集团一直对出口农矿业之外的产业发展进行限制和打压，在零和博弈思维的影响下，双方并没有把对方视作可以合作的伙伴，而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需要击败的敌人。贝朗德阵营以阿普拉党与奥德里亚展开谈判为由开始争夺阿普拉党的支持者，而阿普拉党领导层则认为只有自己才能领导秘鲁的民众主义运动。在这种情况下，阿普拉党当然不会在选举中支持贝朗德。

三 “政治共处”协议的影响

1956年的“政治共处”协议从多方面对秘鲁民众主义运动产生了影响。短期来看，协议的达成使秘鲁的政治格局重新“洗牌”；中期来看，寡头统治的延续为1962年的军人干政埋下了伏笔；长期来看，协议的达成加剧了秘鲁社会的撕裂，代表了外向型和内向型增长模式的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零和博弈不断升级，导致1968年军方再次发动政变并全面接管政府。

（一）“政治共处”协议的达成导致秘鲁政治格局重新“洗牌”

在“政治共处”协议达成之前，秘鲁的政治格局一直保持着由寡头集团和军方组成的保守势力同盟与阿普拉党二元对立的局面，阿普拉党一直是民众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阿普拉党与寡头集团结盟意味着新旧反寡头先锋的整合失败，秘鲁的政治格局出现重大变化。

新形势下的保守势力由寡头集团和阿普拉党组成。相比于右翼势力，左翼势力更为多元复杂。大选失利后，贝朗德在全国民主青年阵线的基础上创建的人民行动党（Acción Popular）成为这一时期秘鲁最重要的左翼力量。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秘鲁天主教会也对深刻变化的社会现实做出了回应，主张以阶级和解代替阶级斗争，旨在将社会成员整合成有机整体^①的基督教民主党成为重要的新兴左翼政党。在中左翼政党之外还出现了激进左翼政党。“政治共处”协议导致阿普拉党内部分裂，认为应该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成员宣布退党并成立了“阿普拉党起义派”（APRA Rebelde）。

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原本属于保守势力的军队一方。首先，军队人员构

^① Julio Cotler, *Clases, Estado y Nación en el Perú*,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1986, pp. 343 - 345.

成发生了变化，军人职业化的推行，使得军人尤其是军官的出身从原来大部分来自上层社会，变成主要来自社会中间阶层。新的军官阶层不再依附于寡头集团，同时他们对秘鲁的社会问题有着更加切身的感受和认识。其次，为了应对包括阿普拉主义在内的不同思潮在军队内部的渗透，秘鲁军方成立了高级军事研究中心等机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安全和国防理论。从此秘鲁军方介入政治不再是出于个人利益或具有个人主义色彩，而是代表了军队的整体意志。最后，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非传统国家安全学说在拉丁美洲广泛传播并产生了不同的变体。秘鲁军方认为，相比外敌入侵对国家安全构成的传统威胁，依附、不平等和落后的社会现实如果不得到改变，有可能会导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这构成了对国家安全更为严重的威胁。基于以上三方面因素，秘鲁军方认为需要尽快改变寡头统治的现状，同时他们认为阿普拉党已经成为保守势力的一部分，而贝朗德阵营所主张的内向型发展则是秘鲁的出路所在。立场转变的秘鲁军方从曾经的寡头统治守护者成为反寡头力量的核心。

（二）“政治共处”协议的达成为1962年军人干政埋下了伏笔

虽然寡头集团和阿普拉党组成的联盟以微弱优势赢得了1956年大选，但是选举结果明确地反映了秘鲁社会对寡头统治的普遍不满。面对来自社会各个阶层要求转变增长模式的呼声，控制了政府、议会和相当一部分工会组织的寡头集团和阿普拉党联盟做出的回应却是将“正统”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战略推行到了极致。普拉多政府上台后不久就在1959年通过了从1955年就开始起草的《工业促进法》（Ley de Promoción Industrial）。虽然这部法律以促进工业发展为名，但是由于缺乏针对性和规划，在实际操作中主要惠及的还是出口部门，对于依赖国内市场的本土制造业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具体而言，1958年本土生产的非耐用消费品的规模已经占到总供给规模的80%^①，在市场日趋饱和的情况下，制造业资产阶级希望实现从非耐用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的产业升级。产业升级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昂贵的资本货物和中间产品，然而制造业企业家自身缺乏足够的资金，政府也没有推出信贷优惠等激励措施。于是1959年的《工业促进法》就成了资金雄厚的初级产品寡头可以借助出口经济繁荣的时机，通过前向关联发展出口加工产业（矿石和鱼粉加工）和通过后向关联发展制造业（渔业船舶建造），以及对跨国公司进军秘鲁消费

^① Mauricio De la Cuba, “Crecimiento Industrial: En un Modelo Primario Exportador y en un Modelo de Sustitución de Importaciones: el Caso Peruano 1958-1969”, en *Apuntes: Revista de Ciencias Sociales*, Vol. 23, 1988, p. 131

品市场提供“补贴”的工具。^①据学者估计,1963年这一“补贴”的规模达到了100亿索尔,相当于当年财政开支的75%。^②

到了普拉多政府后期,积蓄已久的社会矛盾开始集中爆发,城市地区的工人罢工和农村地区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局势随时都有失控的危险。1962年6月,在普拉多总统任期结束前举行的大选中,3名主要的总统候选人贝朗德、阿亚和奥德里亚分别获得了32.19%,32.94%和28.44%的选票。根据当时宪法的规定,候选人必须至少获得1/3的选票才能当选总统,如果没有候选人得票超过1/3,议会投票决定总统人选。立场转变的军方在选举结果公布之前就明确表示不会接受阿亚担任总统,因此阿普拉党开始与奥德里亚阵营商议结盟,而奥德里亚再度出任总统也是军方所不能接受的。面对寡头统治可能延续的前景,1962年7月18日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普拉多政府。政变之后军方成立了由高层组成的军事洪达(Junta Militar,也译为军人执政委员会),同时对外表示成立军事洪达的目的是履行“看守政府”的职能,并承诺会在一年之后重新举行大选。在执政的一年时间内,为了平息南部山区拉孔维西奥谷地的农民运动,军事洪达颁布了一份针对该地区的土地改革法令。除此之外,军方的主要改革措施还包括修改选举法和成立秘鲁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体系等。1963年6月,在重新举行的大选中,贝朗德以39.05%的得票率战胜其他候选人当选总统。

(三)“政治共处”协议进一步加剧了秘鲁社会的分裂

“政治共处”协议进一步加剧了秘鲁社会的分裂,零和博弈的不断升级是1968年军方再次发动政变并全面接管政府的原因。

由于阿普拉党和寡头集团结成联盟,原本就在地理、人口和文化等方面分裂的秘鲁社会,又因为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意见分歧而更加分裂。虽然1962年的军人政变通过威权主义改变了秘鲁的执政者和增长模式,但是内向型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并未得到整合。在贝朗德政府期间,两大利益集团的零和博弈不断升级。虽然在政变后失去了执政地位,但是寡头集团依然掌握着秘鲁的经济命脉。在1963年总统选举中寡头集团虽然不敌贝朗德阵营,但是奥德里亚阵营和阿普拉党组成的联盟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席位。由于政

^① José María Caballero, *Economía Agraria de la Sierra Peruana: Antes de la Reforma Agraria de 1969*,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1981, p. 308.

^② Shane Hunt, “Distribution, Growth and Government: Economic Behavior in Peru”, in Gustav Ranis (ed.),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417.

府推行的改革方案大多需要得到议会批准才能实施，因此保守势力在议会中对任何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改革方案，尤其是民众呼声最高的土地改革极力阻挠。在保守势力的掣肘之下，1964 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极为保守。大地产尤其是蔗糖等农产品出口产业的土地几乎未受影响。

贝朗德政府在执政的过程中同样未能摆脱零和博弈思维的影响。贝朗德政府将内向型增长作为国家战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扩大国内市场和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以汽车和家电产品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是这一时期进口替代的重点。为了刺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贝朗德政府实行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提高耐用消费品的进口关税，大幅调低生产这些产品所需的零部件和资本货的进口关税。与此同时，为了扩大国内市场，政府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扩大社会中间阶层规模，包括修建基础设施、提高医生和教师等职业群体的工资待遇、增加对公立大学的补贴、提高公职人员退休养老金等。仅从 1965 年到 1966 年的 1 年时间里，提高教师收入的开支就占中央财政支出增幅的 40%^①。

贝朗德政府的战略虽然强调通过政府干预解决“正统”经济学造成的结构性矛盾，但由于这种战略只考虑了内向型经济以及执政党所代表的社会中间阶层的消费倾向与能力，而忽视了作为外汇最重要来源的外向型经济部门以及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城市贫困人口和农民，因此同样导致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第一，虽然本土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增加，但这种工业化的实质是进口中间货物和资本货物，只有最后的组装环节是在本地进行，其结果是，本应减少对外部依赖的进口替代战略反而加深了对外依赖的程度。此外，由于进口依赖初级产品出口所换来的外汇，当国际市场对秘鲁初级产品的需求下降时，这种进口替代战略便很快陷入危机。第二，不断扩张的财政支出导致连年赤字，1966 年到 1967 年度的赤字率更是达到了 GDP 的 3%。为了维持财政支出水平，政府不断对外举债，秘鲁政府的外债在 1962 年到 1968 年间翻了 4 番^②。激进的消费刺激政策和扩张性财政导致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导致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而工资上涨又反过来使得通货膨胀更加严重。第三，外资和寡头集团对经济的控制力不降反升。1968 年，制造业资产中只有 1/4 左右是由本土中小企业家控制。1969 年，秘鲁国内 79 家资产超过 1 亿索尔

^① Carlos Contreras (ed.), *Compendio de Historia Económica V: La Economía Peruana entre la Gran Depresión y el Reformismo Militar*,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2014, p. 71.

^② Augusto Álvarez Rodrich, “*Del Estado Empresario al Estado Regulador*”, *Perú 1964-1994: Economía, Sociedad y Política*,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1985, p. 71.

的企业中只有 27 家完全由秘鲁本国投资者控制，只占固定资产总量的 18%。^①

到了 1968 年，民众对社会问题的不满日益升级，而政府对由美国资本控制的石油公司国有化问题的处理方式又让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秘鲁国内局势再度失控。贝朗德政府深陷危机的状况让军方感到，秘鲁社会的问题无法通过现有的政党政治得到解决，为了避免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需要一种超越党派和阶层力量，自上而下将经济增长的红利进行更公平的分配。此时的军方已经有了之前的执政经验，他们认为局势已经刻不容缓。于是在 1968 年 10 月 3 日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贝朗德政府，开始了长达 10 年的军人革命政府时期。

四 结语

1956 年的“政治共处”协议是秘鲁社会转型从外源性的启动阶段进入内源性的纵深发展阶段后的标志性事件。当经历低谷的民众主义运动再次迎来高潮时，曾经领导民众主义运动的阿普拉党却与当初的政敌结盟。内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只有少数人获益的外向型增长模式，使得新兴利益集团提出的内向型发展主张获得了社会多数的支持。陷入危机的寡头集团为了维持统治地位，被迫向阿普拉党寻求支持。阿亚的投机心理和阿普拉党背离建党初衷是阿普拉党接受与寡头集团结盟的原因，而零和博弈的政治文化则是阿普拉党没有与贝朗德阵营合作的原因。协议的达成使秘鲁的政治格局重新“洗牌”，军方立场的转变成为 1962 年的军人政变埋下了伏笔。更为重要的是，协议的达成加剧了社会分裂。虽然寡头政权在 1962 年的政变中被推翻，取而代之的贝朗德政府推行了内向型发展战略，但两大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零和博弈导致秘鲁的社会痼疾依然无法得到解决。为了避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军方发动政变并全面接管政府。纵观“政治共处”协议达成的原因和影响，可以看到零和博弈的政治文化导致的整合困难使秘鲁的社会转型陷入了只有排他性增长而没有包容性发展的困境。秘鲁民众主义的本质是寻求包容性发展，当文官政府破解困境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军方便承担起了这项历史任务。秘鲁寻求包容性发展的曲折经历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反思与借鉴。

(责任编辑 徐 睿)

^① E. V. K. Fitzgerald, *La Economía Política del Perú, 1956 - 1978: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Reestructuración del Capital*,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1981, pp. 360 - 361.